



奥运会和巴中校友缘

北京 52年届 方琳(上)



留学苏联

1935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1952年回国考上清华大学水利系。一年后十分荣幸从清华大学被保送至地球最北部的、寒冷的苏联上学。

1954-1959年，就读于莫斯科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学习期间获得苏联国家工程师职称，毕业时获得硕士学位。我是唯一被保送到苏联读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印度尼西亚归侨。

1954年，中国到苏联留学的学生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团员转成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同年，我们一批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大使馆内，在大使刘晓的见证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我已获得苏联国家工程师职称，到苏联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带领工人

建设西伯利亚水电站，为期半年。

同年，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派代表到西伯利亚迎接以辽宁省省长杜青衡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苏方邀请我作为翻译，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旁的接待工作。

本世纪初，我国许多国际倒爷在俄罗斯倒卖山东、东北各地来的衣物、皮夹克、土特产等，华人市场曾被俄罗斯政府查抄关闭，罚没了货物。俄方沸沸扬扬的各种报导传到香港，却一时找不到精通俄语的人准确翻译。在香港工作的印尼归侨提出请我翻译该报导，于是我还协助过香港凤凰卫视做俄语翻译工作，供吴小莉主持转播并评论俄罗斯官方有关俄方突袭中国人在莫斯科的超市的报道节目。

在翻译期间，我

还添加了该报道以外的两个小故事：

其一是，我1957年在莫斯科红场散步时，突然被一名帅气的苏联空军军官拥抱，并热吻着，该军官喃喃低语，亲热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了！”一头雾水的我询问该帅哥时，该苏联空军说：“我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援朝空军共同战斗多年，回国后念念不忘该段战斗友情，今日竟然在莫斯科红场上看见了你这位中国姑娘，我竟然情不自禁地拥抱你热吻。”

其二是我在莫斯科红场上收集的留学人员的谈笑段落。我把俄国强制关闭中国华人超市的官方报道外加两段在莫斯科红场上的小故事传给了吴小莉后，她竟然连我外加的小故事一起朗读播出。

我是巴中52届校友。1952年才16岁半（52届我最小）的我，远渡海洋回到了北京华侨补校。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统一高考；我和许多巴中校友考上了清华大学。就读于清华水利系。一年后我有幸地被国家选派去苏联学习。

说实话：从常年37--38度C赤道上的印度尼西亚；回到冬天零下12度C的北京；我们已经感觉很冷了。再把我送到冰天雪地

的---零下40度C的莫斯科；并在那里学习了5年，光是气候就已经对我这个最年小的巴中生大大的考验了！五年里我勤奋读书，以全优的成绩，取得了硕士学位和苏联国家工程师证书。

1959年回到了北京。被分配到湖南大学任教。我在湖南大学教书的第一课：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采暖通风课程。近200名学生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有许多学生。其中竟然有一位巴中53届比我年岁、个头都大的杨钦茂。讲课还未开始.....他就在200多名学生中向我招手致意。

我对他点点头，开始在黑板上写下30公分大的每一个字.....我以一名从苏联留学获得优异成绩的专家，讲完了我回国后的第一课。

后来，后来.....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土木专家，建筑了国内许多著名的土木工程；其中有北京的金融一条街；中华世纪坛.....等等。没防备到取得成绩太大了，却会被人暗算的经历。有人查看了了我的档案：发现我生长在印尼。突然间；把我拉到毛主席像前，指责我是国民党派到中国的特务。一夜之间，我被关到小黑屋；开始了6个多月的----扫厕所，挑大粪劳改生

活，并被扣押了全部工资；只留下每月15元吃饭钱。

小小年纪的我，可算是从印尼回国后的10多年来，巴中第一个经历了风风光光的，大起大落的Number One啊！

结缘奥运

风风雨雨又过了很多年。临近2008年OLYMPIC。我从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中；有幸的报名参加2008年OLYMPIC志愿者考核。我是唯一一个报名考核印尼语的志愿者。2007年奥组委竟然找不到考官来考我。

2008年在中国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我有幸地成为唯一的巴中校友，被考核了4门外语；而当上了29届Olympic的多语种专家志愿者。

2007年奥组委开始招考奥运会志愿者。我从欧美同学会报名参加考试。我报考的是印尼语。奥组委竟然一时找不到考我的考官。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次他们并不需要英语人才。他们启用了中国无数自费留学英国的学生。而且是在奥运会作为正式的工作人员。每月拿2000元工资。

我是报考4门外语同声翻译的。第一门考印尼语的考官，是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印尼语组长；他一进门，我就用印尼话



奥运会和巴中校友缘

北京 52年届 方琳(中)

说: Selamat datang! 并问他是否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的(先入为主)。他说: 是的! 然后我问他: 毕业后去过印尼吗? 待了多久? 他说: 毕业后去过印尼, 待了一年。我回头就对奥组委领导说: 他在印尼待了一年; 而我在印尼待了十六年半; 谁考谁啊? !

看看多么嚣张的巴中生----- 我啊? 非常傲慢的我, 刚刚开始就把考官得罪了。看来第一场考试我是彻底完蛋了。没成想: 这股傲劲竟然被奥组委的领导十分欣赏。

第二周领导叫我考第二门外语----英语。

第三周领导又叫我, 要考我的俄语。考俄语的那天, 更离奇了。来了300多名

欧美同学会留苏的学生; 还有10来名俄罗斯小姐。于是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两位组长; 老顾.....来了。奥组委领导走到我身边说: “方琳; 你今天免考了! 你替我当上第三名考官! 你们每人考100名被考的志愿者。” 哈哈, 我竟然升上当考官? 还领取了考试证书和考官费800元。升官了!

第四周, 领导又电话通知我: “来一下, 考考你的德语!” “我是四次进官的被考者。考德语是因为会俄语的人, 肯定会德语! 我在巴中英语老师曹燮贤的大公子曹敬和(58届); 二公子曹士和(60届)的德国汉诺威北京办事处工作了2年。当时有许多巴中学生都在曹家的公司任职。其中

公子司徒达生等人; 我负责中国银行和汉诺威银行的业务。用英语发稿和接听电话。被动地学了一些与德国老板交流的德语。我并不怕奥组委考我的德语。当然, 又过关了!

我当上了2008年奥运会“多语种中心”“四门语言同声翻译”的专家。每天坐在专家席上, 处理整个奥运会, 残奥会期间的各种事情, 发奋工作着。我的领导是世界冠军邓亚萍。

每天工作都能看见她。许多处理不了的老外的问题; 要请示并向她汇报。作为志愿者我们是没有收入的。当上了每人发一个奥运会的工作证。

在奥运会期间坐大公共, 地铁全免费。每天有免费午餐。努力工作了几个

个月, 我表现特别突出。终于, 在奥运会160万志愿者中, 被评为一万个先进工作者当中的一名先进工作者。

发了奖状; 奖品是一个瑞士SWATCH女表。当年我又受到欧美同学会领导的接见。并与世界冠军邓亚萍合影留念。

这是巴中的荣誉! 我是巴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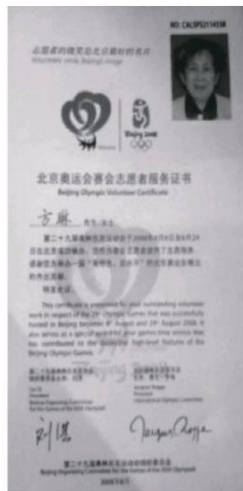
附录: 方琳执笔的《百岁印尼归侨方定坝、白明璇夫妇》一文。方琳的父亲方定坝、母亲白明璇皆为印尼侨领, 他俩谱写了鲜为人知的为印尼华人的斗争史的光辉一页。

方定坝祖籍安徽省歙县, 1906年6月3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镇。中国致公党党员, 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委员会委员、全国

侨联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

方定坝193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系, 因战乱和家境关系, 赴南非工作。1931年在南非经由上海交大同学韦同芳(后任印尼巴城中学物理教师)介绍到印尼, 在雅加达八华中学任教。1940年调入进步报纸《新报》, 负责体育版编辑, 与宋中铨、谢佐舜、林杏超一起, 成为该报四大编辑。

1942年日寇南侵东南亚, 登陆雅加达, 搜捕《新报》《生活报》主要人员, 宋中铨、谢佐舜逃脱, 其余大都关押至集中营。方定坝、白明璇夫妇与司徒赞(巴城中学校长)、刘金端等500多进步人士一起先后被关押在芝槟榔(Cipinang)和芝马圩(Cimahi)国际集中营



◀ 作为2008年奥运会多语种专家的方琳在工作

方琳的在2006年获颁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志愿者服务证书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欧美同学会召开庆祝会,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主持为方琳颁发奖状后合影





奥运会和巴中校友缘

北京 52年届 方琳(下)

内,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关押长达40多个月。

1949年由集中营共患难好友林德昌(福建籍华裔)、林杏超(JCPL渣华轮船公司华人部负责人)资助,方定坝在雅加达市中心成立第一个华人书店兼体育器材店“O.K. Sport”,经营进步书籍。

我母亲白明璇是福建省安溪县人,1911年3月18日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市。1929年在新加坡中华女子学校师范班毕业。1930-1942年在加里曼丹、新加坡、雅加达等地教书。

白明璇1941年与著名侨领司徒赞及夫人刘金端、儿子司徒巴生、司徒眉生等人一起组方定坝、白明璇夫妇织巴达维亚华侨抗日后援会。

1943年由于参加上述抗日地下组织,白明璇、刘金端、司徒巴生、司徒眉生等人被日寇抓捕,关在狱中。司徒巴生和司徒眉生年幼被无罪释放。白明璇和刘金瑞被移至三宝垄女子监狱,作为政治犯关押。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释放。白明璇、刘金瑞是被日寇关押的仅有的两位华侨抗日政治犯,由荷兰女皇给她们颁发荣誉勋章。



2000年全家人聚会为两位老人过生日

1946年起,白明璇在“O.K. Sport”书店担任总会计师,主持内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爱国青年在该店阅读书报,为他们日后参加革命,起了启蒙教育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白明璇根据报刊上登载的新中国国旗的图案和《生活报》提供的资料,在“O.K. Sport”书店带领妇女们连夜亲手绣出印度尼西亚最早的两面五星红旗,分别悬挂在“O.K. Sport”书店和雅加达中华中学。这两面五星红旗象征着印尼华侨们热爱祖国的一颗红心。

此时,白明璇等爱国华侨带头组织了雅加达市华侨妇女联合会,并组织了读书会,影响了一代华侨青年追求进步,不少人回到祖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1950年印尼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庆,方定坝担任第一届华侨运动会的总指挥,在会上升起了由白明璇等绣制的五星红旗,大大鼓舞了侨胞们的爱国热情。

庆祝会后,方定坝和许多爱国侨胞被捕入狱一年余。这期间,白明璇默默地替方定坝主持“O.K. Sport”书店和继续做联络侨胞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方定坝曾带领印尼华侨篮球队参加在南京市举行的篮球比赛,在该会上认识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53年,贺龙率中国足球队赴印尼比赛,到印尼后为安全起见,委托方定坝分管中国足球队的生活和伙食。期间,贺老总还请方定坝教练协助挑选才华出众的印尼华侨运动员回国。从此,方定坝做了许多工作,约有300多名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的运动员陆续回

国,国家体委将他们安排在福建等省体委,把他们培养成为出色的著名运动员。1959年底,印尼的“总统10号令”引发了排华潮。方定坝携全家回中国。国家体委决定安排方定坝到福建省体委担任副主任,并分配一套住房。方并未接受这个安排。

1960年中侨委国外司副司长陈曼云安排方定坝返回印尼工作,回国后因陈曼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致使方定坝得不到安排,长期待业。1978年因生活,政治上困难,女儿方琳给邓小平写信,报告方定坝的爱国情怀,与贺龙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挑选和动员优秀运动员回国等,以及“文革”中得不到安排,面临生活困难等问题。

1979年邓小平同志批示要为方定坝落

实政策,由国务院信访办来北京朝内大街318号给方定坝落实政策:决定把方定坝调到国家体委,局级待遇,可阅读《大参考》。此时方定坝已经年过古稀,他决定退休,仅保留国家体委委员职务,同时义务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主要在侨务及体育方面建言献策。

方定坝要求把外地工作的女儿调回北京,国务院信访办给予落实安排。

在东城区工作期间,方定坝曾两次邀请徐寅生到东城区作了亚非运动会及全国运动会的报告。

方定坝于2006年7月4日凌晨1点去世。享年100岁零31天。

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携手一生。他俩逝世后,没有举行追悼会,把骨灰撒入太平洋海域,回归中国,也回归印度尼西亚。



方定坝、白明璇夫妇